



Иван Козлов

В КРЫМСКОМ ПОДПОЛЬ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下地亞米里克在

譯 焚 羅 著 夫 洛 茲 柯 · 萬 依

行發店書聯三知新 · 書讀 · 活生

在克里米亞地下

著夫茲柯·萬依
譯 焚 羅

知新書讀·活生

店書聯一

669·Q381·32K·P·594·\$18.4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〇年九月第一版

星光印刷廠承印

北京 控9001—7000冊

· 總 管 理 處 ·

北京西總布胡同二十九號

· 各 地 分 店 ·

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路 瀋陽太原街 廣州永漢路

天津 濟南 西安 長沙 開封

香港 大連 哈爾濱 重慶

我獻上這本書，紀念爲了祖國底自由與獨立而對德國法西斯佔領者鬥爭中犧牲的愛國志士們——地下工作者們。他們以光輝形象與英雄事蹟成爲爲了共產主義底勝利而鬥爭的我們光榮青年的模範。

依萬·安德列維契·柯茲洛夫

在克里米亞地下一書，是老布爾什維克依·安·柯茲洛夫所作。他是一個富有經驗的黨的地下工作者。在德寇佔領期中，起先在克爾其，後來在新菲羅波爾領導地下黨中心。

他以其十月革命前的和內戰時的豐富的地下工作經驗，參加了這一活動。

新菲羅波爾的地下活動，是柯茲洛夫同志底同黨底鬥爭密切接合的、長期生活中的第六次地下活動。

一九〇五年，柯茲洛夫在柯洛明汽車工廠作工時，他就參加了布爾什維克黨。一九〇八年被捕，後從流放中逃出，繼續從事『非法活動』，旋又被捕。柯茲洛夫同志在烏拉季米爾中央監獄的審訊中度了兩年半。一九一一年，法庭給他判決了四年苦役。一九一四年他從西伯利亞逃到國外，隨後又返回俄國作地下活動。國內戰爭時，

黨曾派柯茲洛夫同志作反對佛蘭格爾和鄧尼金的地下工作。

柯茲洛夫同志因有其過去黨工作的經驗，故是領導克里米亞蘇維埃愛國者秘密中心的最適合的人物。而這個重要的、艱巨的任務正好付託給他了。

近幾年來，出現了不少描寫偉大愛國戰爭中反德游擊戰爭的藝術的和回憶的作品。但描寫蘇維埃人在暫時被德寇佔領城市中的鬥爭的作品卻非常的少。依·柯茲洛夫底在克里米亞地下一書正好填補了史實文學中的這一題材上的空白。

依萬·安德列維契·柯茲洛夫

在克里米亞地下一書，是老布爾什維克依·安·柯茲洛夫所作。他是一個富有經驗的黨的地下工作者。在德寇佔領期中，起先在克爾其，後來在新菲羅波爾領導地下黨中心。

他以其十月革命前的和內戰時的豐富的地下工作經驗，參加了這一活動。

新菲羅波爾的地下活動，是柯茲洛夫同志底同黨底鬥爭密切接合的、長期生活中的第六次地下活動。

一九〇五年，柯茲洛夫在柯洛明汽車工廠作工時，他就參加了布爾什維克黨。一九〇八年被捕，後從流放中逃出，繼續從事『非法活動』，旋又被捕。柯茲洛夫同志在烏拉季米爾中央監獄的審訊中度了兩年半。一九一一年，法庭給他判決了四年苦役。一九一四年他從西伯利亞逃到國外，隨後又返回俄國作地下活動。國內戰爭時，

給你開開刀，但不能保證一定能好。」

的確，開刀以後，我的左眼完全失明，痛的更厲害了，不得不又開一次刀。

現在疼痛倒並不使我不安，但是一種恐怖苦惱着我：我還能不能再看見光亮，還不能工作呢？或者我將變成一個瞎子、變成一個無告的老頭，甚至於無力自個兒走出醫院嗎？

我的鄰床的一個老集體農民瓦西里·彼得洛維契也發生了這種現象，他的一雙眼睛在開刀之後一下都瞎了。他常常來我床上坐下。這個老盲人有著多麼令人感動的好心腸呵！他竭力用『最後一切都會好的』、『我們兩人的眼睛都會看見的』這樣的希望來安慰我。

我兩眼纏了綑帶躺着，反覆地想了許多。如果我變成一個瞎子而且不能工作，那我還活着幹什麼呢？

但我的腦子裏沒有起過自殺的念頭，甚至在我一生最惡劣的時候——在沙皇的苦役中。而且正是在那裏，帶着腳鐐被鎖閉着，在孤獨的重壓的死寂裏，我真正地喜愛生命和懂得了空氣、陽光、自由底真實的價值。一九一三年，當我在多年牢獄的禁錮

之後，流放到西伯利亞，來到葉尼塞斯克的大森林裏時，我甚至不忍心踐踏野草、攀折花朵、殺害飛鳥和走獸。

我考慮很久，如果我成瞎子了還能幹什麼。於是我決定，那就寫回憶錄。當我眼睛好的時候，正好我沒有時間作這個工作。我想我給妻子口述，讓她記。這樣決定以後，我一下子就有了生氣了。

但是不能忘記的六月的一天來到了，瓦西里·彼得洛維契走到我床邊，說道：

『莫洛托夫馬上就要講話了。有趣的是，會說些什麼呢？』

戰爭底消息使我很激動。我忘記了醫生對我的靜躺勿動的嚴厲吩咐，從床上坐起來，打算往上拉一拉綑帶，以便知道我是否還能看見一點，但眼睛被綑帶包紮得緊緊的。

『什麼，打仗嗎，依萬·安得列維契？』我聽見瓦西里·彼得洛維契底聲音。

『是的，打仗了，我的朋友。德國人向我們爬來了。』

『那應該趕緊回家去，』老頭子驚恐地說道，『兒子和女婿都會進軍隊去的，趕去和他們道道別也好。』

『當然，每個人都應趕快走上自己的崗位。我聽說，莫洛托夫同志說了：全體人民都要參戰，這是保衛祖國的戰爭哩。』

這種『各就其位』的志向是人所共有的。我們這兒也宣佈了：病院要改成野戰醫院，只有重病人才能留在這裏。但就是重病人也不願意留下，他們希望回家去。

我堅持提前給我取掉綑帶。真使我高興，右眼還保存着百分之十五的視力，就是說，戴上眼鏡，行動和工作都還是可以的。

過了一天，給我弄去了眼上的縫合綫。我接受了不准作體力勞動，不准讀書，不准寫字，而且得在醫生底經常護理下並每日往眼裏點眼藥的指示之後，提前出院了。聽完了所有這些吩咐之後，我立刻起程回克里米亞去了。

*

*

*

我是白天到了新菲羅波爾的，我已經不認識我的這整潔而寧靜的城市了。各個住宅底潔白的、淺藍的、淡黃色的牆壁都塗成了一片一片的黃綠色，偽裝起來了。窗玻璃糊滿了交叉的紙條。窗上消失了花朵和窗簾。商店底玻璃櫥都用木板擋起來，堆着

石頭和沙包。列寧公園內的溝渠附近，橫七豎八地堆起了黃土堆。

『請問，女公民，德國人轟炸過新菲羅波爾嗎？』我問一個碰着的年青女人。她懷疑地看了看我和我的手提箱。

『您不是本地人嗎？』

『我家在這裏，但我現在剛從車站來。』

『回到家裏，您就會知道的。』她冷淡地說道。

在列夫·托爾斯泰大街底廣播站跟前，圍着一大堆人。他們在聽七月一日的作戰公報。我站下了。無線電廣播說：各條戰綫都正進行着激烈的戰鬥。敵人向東突進，已經向明斯克、莫爾曼斯克、包伯魯斯克、陸茨克方面推進了。沉痛的消息啊！

最後消息的播送，突然中斷了，播音機傳出一陣喧嚷，不一會廣播員底尖銳的嗓音宣佈了：

『注意！注意！城裏發空襲警報了！』

警笛刺耳地叫着。工廠底拉長的汽笛聲也響開了。人羣很快地稀少起來。人們躲藏在就近人家底屋簷下和地下室裏。大門旁出現了帶防毒面具的糾察隊。

我的家離得不遠，於是我就不管糾察隊的吆喝，大步向家走去。我們底被街上栗樹底綠蔭覆蓋的兩層樓的小房，也刷成了慘淡的灰色。我按了按門鈴，沒人打理——屋裏沒有人。我走進院子，向房頂望了一眼，就嚇住了：五個小孩——我的兩個孩子也在內——赤着腳，穿着短褲，戴着大的帆布帽盔和同樣大的帆布手套，坐在煙囪旁邊，點着什麼東西，一會又馬上用手套把它弄滅了。

我的孩子們聽見我的聲音，即刻就走到地上來，歡歡喜喜地走到我跟前。

『你們在那裏幹什麼？』我嚴厲地問道。

『燒一個小木梳子！我們在練習怎麼撲滅燃燒彈哩。』

屋子裏亂七八糟，桌上和地板上亂扔着各種器具、鉋屑、罐頭盒子。

『你們在這裏作什麼？』

『我們在作望遠鏡，好看飛機。』幼小的孩子列瓦熱情地回答。

『誰帶着你們？媽媽嗎？』

『媽媽現在不大在家：一會上工去了，一會值班去了。她也在自衛組呢。』

『是說，一下就看出你們是這裏的全權主人了。』

「會我的妻子就來看孩子們來了。當她看見我後，她是多麼的高興啊！」

「我一直在担心你的病和你怎樣離開莫斯科哩。」

……晚上，當孩子們睡下之後，我同妻子談了很久。

「必須盡力保護留下的視力。請你執行醫生底一切吩咐吧。」我的妻子反覆說道。我的提前出院，使她很担心。

「要是聽醫生的話，那我就不可作體力勞動，不可讀書寫字，不可興奮。這就是說，什麼也都不可作了。」

「那總也比瞎了好。」

「不會瞎的。目前不工作是不成的。」

一般說來，我們的談話是不愉快的。

但是，在這樣的時候，停着什麼也不作，是不行的。於是，我馬上就到我曾在那裏作了五年聯絡員的省委會去了。我那時是整理聯共（布）黨市委和區委所開除出黨的人們底材料，給省委會討論。這工作是需要多讀和多寫的。現在因為眼病，我不能再作這個工作了。而且我想作一些更有效的、同戰爭更有聯繫的事情。

照我的請求，我被調到了一般的聯絡工作上。我開始奔忙起來：到企業部門中去，檢查基層黨組織底工作，幫助它們走上戰爭的軌道。

前綫傳來了令人不安的消息。奧德薩正被英勇地保衛着，但德國人已經佔領了尼古拉也夫、赫爾松，渡過了德涅泊河到達了烏克蘭河。戰綫迅速在逼近克里米亞。

婦女、兒童和病人底疏散開始了。我把我的孩子們送到中亞細亞。我們還相信敵人攻不下克里米亞的。『我們要參加克里米亞的保衛戰，迫不得已時，我們最後再撤退』。——我同妻子決定了。

九月二十四日，當我來到葉巴托里亞執行任務的時候，當地市委正接到一項秘密指令，要趕緊疏散一切有孩子的女人和不能勞動的男人，留下的共產黨員要轉入備戰狀態。在紅軍撤出城內時，共產黨員由省委管理。

這個指令在市委工作人員中間引起了很大的不安。他們要我再留一天幫助他們，我同意了。而晚上十點鐘左右，市委書記接到一個通知：德國人夜裏要在葉巴托里亞區內投下陸戰隊——一個降落傘兵師。

我笑了。

『整整一師？你相信嗎？』

『爲什麼不能？』

『這是造謠！奸細們竭力在引起恐慌。』

我們爭論得吵起來了。但我們終於討論開了萬一發現陸戰隊時的措施。城裏有一個驅逐營和一些民兵。志願兵們——共產黨員和非黨的愛國者——已經組成了一支游擊隊，在我們的部隊萬一被迫撤退時，這支隊伍就留在敵人底後方。

討論得很久，我看了看錶——三點半鐘。我走到街上，夜晚是陰沉而靜寂的。在彼列柯普發生什麼事了呢？難道德國人能這麼快地突破我們的防禦嗎？不會的。顯然省委是採取的預防方法。但要是德國人終於竄到克里米亞了呢？這思想使我的心都涼了。

我轉回市委會去，對市委書記說道：

『我真羨慕那些身體健康的人：祇須把鎗往肩上一掛——當游擊隊去就行了。』
『游擊隊的問題倒挺簡單，可是關係地下工作者的事，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呢。』

『那你有地下工作人員嗎？』我驚奇了。

『有呀！按省委給的任務，我派了五個共產黨員去作這個工作，但是，你知道，他們害怕留在這裏。』

『爲什麼？』

『城裏人都很熟悉這幾個人。德國人來了，——會首先把他們絞死的。』

『那爲什麼偏要把他們留在這裏呢？』我疑問地說道，『應該把他們派到誰也不知道他們的地區去，而且要掩蔽得連自己的妻子都不知道的。』

『事情是很緊要的，可是我們一點經驗也沒有，因此就弄成這樣子了。』市委書記承認道。

我談了一些內戰時我們在敵後用過的掩蔽方法。

同市委書記的談話，很久地在我的腦子裏縈繞。

『當然，同志們是對的。他們全都是些有知識的人，優秀的共產黨員，但他們從哪裏得到地下工作經驗呢？必須趕快把這件事情同省委會談談並且幫助他們。說真話，這工作對我倒是最合適的。』

這樣決定以後，第二天清晨我就乘車回新菲羅波爾去了。

在新菲羅波爾，妻子告訴我她就要同省委底一羣工作人員出發到悉瓦斯托波爾去，而我則被指定疏散到後方去。

『大家認為，你這樣的身體是不能派到悉瓦斯托波爾去的。』

『又是我的身體！』我生氣了，『多麼倒霉！爲什麼大家都把我當作一個完全殘廢的人？你明白嗎，這多使人難過？你知道，茨柳？』當我稍微平靜些的時候，我對妻子說道：『我從來沒對你隱瞞過什麼事情。要是我同你去參加游擊隊，那當然是不適合的，但有些同志要留在這裏作地下工作，而我在這方面是有很多經驗的……』

『那你打算作什麼呢？』她小心地問道。

『我決定同地下工作人員們一起留下。』

我的妻子遲疑了一會。

『我了解，在地下工作上，很難找着代替你的，但你隨時都可能變成瞎子呢。』

『當然，什麼都可能發生的，但這是戰爭呀！』

『那我作什麼呢？』